

论从周刊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邱海平

争的客观形势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新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地继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运动、革命,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如何在理论上对抗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代言人的首要任务。于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不久,即19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等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兴起了所谓“边际革命”。由于“政治经济学”已经被马克思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干脆连这个概念也忌讳和抛弃了。从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因为自马歇尔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抛弃了价值概念和理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因而,是否研究价值问题就成为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标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繁多,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最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最适合为资本主义提供理论辩护,所以,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

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爆发,最近的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面对这些经济困局,除了重复和修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是将二者进行混合之外,再也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了。

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是要借鉴其先进经验,而不是全盘照抄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党一直在艰苦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更多地借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设想的影响,形成了一大二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和体制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必须进行改革。

与前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且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具体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即



□ 梁新

站在新起点上,谁不想实现新跨越,快发展?站在新格局上,谁不想适应新常态,实现新突破?谁不想发展更快一点,更好一点,改革更深一点,更稳一点,早日实现群众的愿望,早日满足群众的期待?正因为取得的成绩,才使我们满怀激情,这个时候制订目标任务,更需要头脑冷静、清醒;不犯急躁错误。发展是一件务实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来不得半点虚假;急于求成,往往会欲速则不达。只有脚踏实地,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步步高升;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比保持做事的激情,更需要睿智,更需要谨慎,更需要务实。

什么样的目标任务才最能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又让人不懈怠呢?首先,目标任务既不能订得过高,又不能订得偏低。订得过高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和格局,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严峻形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本来,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并不是要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然而,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我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也由于中国的实践已经在事实上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于是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而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怪现象。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的由来。如上所述,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世界上两大主要经济理论。虽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都抛弃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同时,为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区分,所以,在重新介绍和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概念确有其不合理之处,因为从地域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西方经济学”。但是,对于中国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自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等等。国际国内因素和条件的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观形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发表怀疑中国道路和模式的言论,国内许多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和一些网络大V们继续秉持他们一贯的观点和主张,大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大肆攻击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无批判性地传播,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结果不仅许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对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做法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政治

相关

政治经济学小史

“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生产、分配的规律。这就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劳资矛盾逐渐凸显。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现存经济秩序的内在矛盾日益暴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者们更加需要的是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以萨伊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

(本报编辑整理)

经济学界提出的殷切期望。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但是,从学习和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如何“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中国的状况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即它是一种舶来品。中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的小学生,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小学生,19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小学生。但是,我们党始终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而是勇敢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党革命和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质、最核心和最主要的内容。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因而,我们既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学好用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要做“真科研”

□ 冯钢

目前的很多科研工作都是项目驱动或经费驱动,而非科学探索兴趣驱动。

所谓“真科研”,在我的理解中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要从兴趣出发,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符合科学技术本质特征的研究工作,需要个人长期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地对一个科学问题进行专研;另一方面“真科研”是对国民经济、科技发展起重大引领作用的项目,可能需要跨学科的协调,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但要向“真科研”转变,一方面需要我们科研人员转变观念,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配套制度的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科研管理的理念和制度改革方面狠下功夫。

普遍而言,我们之前的科研状态与“真科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很多科研工作都是项目驱动或经费驱动,而非科学探索兴趣驱动。这种状态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理由,既有科研工作观念的因素,也有科研管理体制的因素。诸多因素共同形成了我们转向“真科研”的多种交织的障碍。

“真科研”需要宽松的环境。要做出真正具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研究,没有在一个方向上进行一定时期的积累是很难实现的。但当科研工作总是被生存问题、考评问题、项目问题、经费问题困扰,即便他在主观上并不是从钱财出发,也很难对这些困扰置之不理。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研究总是被项目或短期考核“牵着鼻子走”,哪个领域有项目,就去哪个领域;今年做这个方向,明年做另一个方向。我们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很难静下心来“定居”在某个领域“精耕细作”。我们可能经常做大量的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表面上看起来“红红火火”,但实际上无法在某一领域深入探索、持久积累。

我曾在国外学习工作十余年,对国内外科研管理体制的区别有较深的理解。今年3月又到巴黎第十一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Sud)访问了一个多月时间,对其科研管理制度也做了一定的观察和了解。巴黎第十一大学对科研工作的业绩考核比较宽松,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具体的年度指标考核,只是在教学方面比较重视考核。很多人可能会疑惑甚至担心: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巴黎第十一大学怎么可能出成果?会不会有一些人滥竽充数或缺乏追求卓越的动机呢?其实不然,让我震惊的是,过去几年里,该校获得了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也获得了两个菲尔兹奖(Field's Medal)——该奖是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之名设立的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还诞生了众多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放松考核反而能出成果,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我们可知,诺贝尔奖成果都要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实践检验,也需要科研人员潜心于此、长期坚持。我所了解的几位获奖者,根本没有抬起头来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经费,确实是不为名、不为利的境界。这与他们个人的境界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的科研管理制度紧密相关。因此,高校要在科研管理制度改革上做出调整或改革,否则,做“真科研”就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而只能靠“发扬个人的风格”。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措施,高校最好组织系统的调研和分析,以制定出切实适合自身的科研管理体制,统筹兼顾地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今后的科技工作中,高校可采用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考核和管理制度,在原有考核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更加多样化的考核方式,能够更加灵活地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科研工作提供多种方式、不同需求的考核。即便不能“一步到位”地实现改革目标,也是可以逐渐优化,采取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迈出这一步,既需要科研管理者的魄力,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总之,高校应在研究、借鉴国内外基础科学研究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较大魄力,推进科研体制向保障实施“真科研”转变。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教授)